

貧學生富學生皆感上流難

我們除了要在公共政策及財政方面協助貧窮家庭子女獲得升大學機會，更要在大學不斷拓招時，着力擴大本港經濟多元化，推動產業多元化，力推傳統及新興產業，拓大本港經濟在區域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莫家豪

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
(研究與發展)



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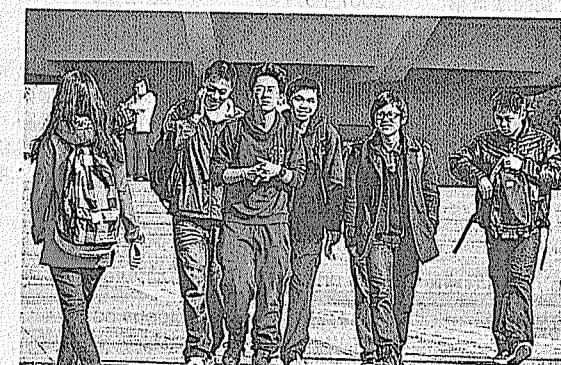
日由教院亞洲與政策研究系進行的調查顯示，過去20年窮學生與富學生升大學比例差距日漸拉闊。教院周基利教授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窮學生升大學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10人有1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學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

貧富學生升大學 比例拉闊

另外，父親學歷背景、居住環境等因素，均增加富學生升大學機會，令窮富學生升大學的機會率差距擴闊。這種趨勢長此下去，將會加劇本港貧富懸殊，令基層學生無法透過教育改善經濟情況。

上述的研究發現恰好與筆者近年在廣州、香港及台北三地進行有關大學生對未來社會流動機會及職業機會主觀評估有着密切關係。

筆者於2012年分別在上述3個城市進行對大學生訪問，當中不少大學生都認為代際對大學生升學造成很深遠影響。在廣州，53%受訪者表示父母及親戚的意見及家庭資源對其大學學校及專業的選擇產生影響。在香港，只有4.1%受訪者認為這影響「非常大」，6.8%的人選擇「較大」，30.1%的人選擇「一般」。而在台北，6.8%的受訪者認為此影響「非常大」，21.1%的人選擇「較大」，35.4%的人選擇「一般」。從表面的統計資料似乎可看出，相對於香港，台北及廣州的



筆者認為，香港除了協助貧窮家庭子女升讀大學外，更要擴大本港經濟多元化。
(資料圖片)

學生對學校及專業選擇受父母及親戚影響的程度較深。

大學生上流趨難 8成同意

此外，在廣州，76.6%受訪者認同家庭背景及其資源對一個人的前途發展有「非常大」或「較大」的影響。在台北及香港，都有超過7成以上受訪者同意這種講法。筆者對周基利教授提出有關政策方向以解決貧富之間不公平現象表示同意。但在筆者有關中港台三地有關大學生對社會流動評價調查顯示，當三地大學生不斷增加時，不少大學生開始對大學畢業與社會流動引起正面影響有所保留。

當被問及「現在大學生向社會上層流動的管道比以前狹窄了」的說法時，本調查發現，53.9%廣州受訪者認同這說法，而在台灣及香港，也有人提出「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現在大學畢業生要奮鬥成為中產階級，難度增大了」的說法，對此有香港受訪者支持達77.9%，台北大學生則有81.6%贊成這講法。

綜合上述調查，我們除了要在公共政策及財政方面協助貧窮家庭子女獲得升大學機會，更要在大學不斷拓招時，着力擴大本港經濟多元化，推動產業多元化，力推傳統及新興產業，拓大本港經濟在區域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否則，香港將面對台灣、日本及歐洲不少地區同樣遇到的，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造成的種種不同社會問題。

你有回應？即上

<http://www.hket.com/eti/chinank.do>

如何加強香港社會的共融性

周基利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重組後在1月18日舉行首次會議。督導委員會表示會深入研究6項議題，其中一項是加強香港社會的共融性。近年來，中港矛盾愈來愈嚴重，不難想像港人對由內地新來港定居的人士（新移民）會有不歡迎、甚至歧視的態度。日前特首梁振英到電台解釋他的施政報告時，便有市民要求他減少新移民來港的人數。

新移民是人口主要生力軍

過去10年，新移民大約有90萬，佔本港人口約12%，他們大都是港人在內地的妻子和子女，鑑於本港出生率長期偏低，他們可說是我們人口的主要生力軍。估計未來每年仍然會大約有四五萬新移民來港定居。在政策層面來說，新移民能否在經濟、社交和文化方面融入香港社會，是政府和整個社會都應該非常關心的課題。上年2月筆者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了一項港人對新移民態度的調查，包括新移民對香港文化生活的影響、對新移民的偏見，以及其他港人與新移民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是次調查我們成功用電話訪問了1024位年齡18歲或以上的港人，整體回應比率為65%。

結果顯示只有約兩成二（21.6%）受訪者認為新移民對香港文化生活有正面的影響，亦只有一成四（13.6%）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因新移民來港定居而變成一個更好的居住地方。其實新移民亦可以豐富本地文化生活的，因為很多新移民在文化藝術上是有一定的成就，政府要多做工夫，令社會人士知道新移民在這方面的貢獻。

在偏見方面，有兩成九反對或非常反對新移民是勤力的，有兩成三（22.6%）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新移民是不誠實的，亦有一成七同意或非常同意新移民是無知的。要知道這些數字其實未必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或不想公開表明自己是一個有偏見的人。這現象稱之謂社會讚許性（social desirability）。所以真實情況是應比調查結果更差。以此推論港人對新移民的偏見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如何糾正它。

港人對新移民存在偏見 問題是如何糾正

在社會距離方面，有近兩成（19.7%）受訪者介意或非常介意一名新移民被委派做他的上司，一成七受訪者介意或非常介意一名新移民和他一個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結婚，亦有五成三受訪者沒有新移民的朋友。若果港人真的能接受新



周基利：筆者希望政府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明白，港人對新移民的態度，對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困難度和速度都有一定的影響。

移民是我們的一分子，無分彼此，我們便不會再介意他們成為我們的上司、朋友或家人。研究結果顯示港人的態度和這個目標尚有一段距離。

現在政府是有幫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會的措施的，例如地區為本融入社區計劃、大使計劃、期望管理計劃等，但這些計劃的對象都是新移民，所以現有的政策是忽略了針對港人方面的工作。筆者希望政府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明白，港人對新移民的態度對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困難度和速度都有一定的影響。試想想，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社會，其中一個必要的條件便是得到港人的接納。要做到這一點，不是電視上一兩個叫人彼此和睦的政府

宣傳片可以做到的。筆者認為一些有效針對性的措施是必須的。當然政府最關心的可能只是新移民如何能夠盡快投入本港的勞動市場，對本地生產力有所貢獻，但筆者想提醒政府，港人對新移民的態度亦會對此有一定影響。試問假如港人對新移民的態度惡劣、甚至有歧視成分，他們又如何找到合適的工作，可以愉快地工作及有滿足感呢？筆者希望重組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可以有一個嶄新的角度處理這問題，令新移民真的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融入本地社會。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